

淮上魏武旧战场——千秋功过付评章(下)

——曹操在淮南的兵争与治迹

杨道文

二、芍陂屯田与州来旧事,曹操在淮南的治水与兵争遗存

曹操在淮南留下最深的一笔,不是哪一场胜仗,而是屯田。

芍陂,又叫安丰塘,在今寿县南部。楚庄王时由孙叔敖主持修建,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之一。汉代以后年久失修,到建安年间已经淤塞严重。周边百姓守着这么大的塘,却用不上水,旱时颗粒无收,涝时一片汪洋。

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前后,曹操派刘馥为扬州刺史,单骑入合肥。刘馥在合肥“数年中恩化大行”,重新疏浚芍陂、茹陂、七门、吴塘这些水利设施,招募流民屯田。其中芍陂的修复最见功夫——刘馥“修复芍陂,堰山谷,筑堤坝,引潞水入陂”,把一座快要废掉的大塘重新盘活。这一段《三国志·魏书·刘馥传》有明确记载。刘馥之后,三国后期邓艾在淮河南北大规模屯田,芍陂再一次被疏浚利用。两汉到三国两晋,芍陂是整个江淮地区最稳的粮仓之一。曹操和魏国之所以能在淮南站住脚,跟芍陂、茹陂这些水利设施有直接关系,打仗打的是粮草,粮草靠的是水。

碭石山下的旧战场,是曹操在淮南的另一处遗存。

碭山口在凤台县西南,是千里淮河第一峡。这里山势险要,水流湍急,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。东吴为了遏制曹魏南下,多次在这一带设防。周瑜死后,孙权派周胤、孙皎先后镇守皖城。建安十九年(公元214年),吕蒙、

孙皎攻皖城,俘虏了庐江太守朱光;建安二十五年(公元220年),孙权又派诸葛瑾、张霸攻襄阳,自己率军攻合肥,碭山口一线是必经之路。

但曹操本人没有留下“亲征碭山口”的明确史实。今天碭石山上有“西碭石”和“东碭石”两处景点,山顶留有南宋咸淳十年(公元1274年)筑城摩崖石刻,记的是南宋贾似道在淮河沿线筑筑城堡、抵御蒙古军的事。碭石山下的战争记忆,从三国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,传说的成分多,史实的成分少,但作为“千年战场”的文化符号,足够厚重。

三、正视历史,新时代曹操在淮南文化的研究传承

曹操在淮南的故事,过去讲得太杂、太乱。

有讲打仗的,把曹操夸成战神;有讲阴谋的,把曹操骂成奸雄;有讲文采的,把“对酒当歌”翻来覆去地讲。讲来讲去,曹操在淮南这片土地上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的事,反倒没人说清楚。

让我们回到史料里来,《三国志》《后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《水经注》《寿州志》《重修凤台县志》《亳州志》这些基本史料被系统梳理过一遍,曹操在淮南的几次军事行动、芍陂屯田的几个关键节点、碭石山下的战事沿革,都有了相对清晰的脉络。这件事不算轰动,但扎实,是后续所有讨论的基础。曹操在寿县隐贤镇练过兵,造过兵器是千真万确的史实。曹操攻打东吴时,在此驻扎操练,并在淠河上操练水军。当时为制造兵器,支起数百架火炉用以锻造,故隐贤镇最早的名

称是“百炉镇”。唐代以后,韩愈同窗好友董邵南隐居于此,后人为纪念他,才将“百炉镇”改名为隐贤镇。

我们在研究曹操的同时,曹操故事也在重写。曹操在淮南的形象,从“乱世奸雄”慢慢回到了“政治军事统帅”,他平定袁术、稳定江淮,客观上让这一带的百姓少受了几年战乱,他派刘馥修芍陂、招流民屯田,淮南人吃了几百年的饭。这一进一退,曹操在淮南的“历史面貌”就立体了起来。

讲故事的方式也在变。我们在想,如果淮南、亳州把各自的曹操遗存拿出来,淮南拿出芍陂、寿春古城、茅仙洞、八公山;亳州拿出运兵道、曹氏宗族墓群、花戏楼。两地互推客源,游客看一条线,把整个皖北的曹操文化看全。这个思路是对的,单打独斗,谁都撑不起一个“曹操”的大IP;联起手来,皖北的魏武文化才能成气候。

当然要承认,曹操在淮南的研究还有不少空白。曹操在寿春的驻所、他的几次具体行军路线、屯田的实际情况,这些细节都还需要更扎实的考据。但方向已经摆在那里了,先把史料啃透,再讲故事,别急着造景。

四、英雄霸业终古流,淮上曹操文化的当代回响

曹操最后一次离开淮南,是建安十四年(公元209年)那次南征孙权。那一年他55岁,征途至合肥无功而返。回师之后,他写下了《步出夏门行》四章,其中《龟虽寿》一句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;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,成了千古名句。这首诗是在邳城写的,不是在淮南,但那个年龄的曹操,淮南已经是他记忆中的年轻时反

复征战的旧战场了。

曹操死的当年(公元220年),其子曹丕代汉,建立曹魏。曹操活着的时候没有称帝,但曹魏的基业,是他在淮南、在冀州、在关中一仗一仗打下来的。

今天回过头看曹操在淮南,留下的东西大致可以分三样:

一是实实在在的水利遗存。芍陂(安丰塘)从孙叔敖建、刘馥修、邓艾疏,到今天仍然在灌溉着寿县南部数十万亩耕地。一座水利工程能活两千多年,这本身就是奇迹。

二是确实发生过的事迹。寿春、碭石山、合肥、皖城——这些地名背后是真实的历史事件,曹操的兵马确实来过,仗确实打过,胜负也确实分过。

三是后人附会、添加、扩展的文化记忆。“曹操在隐贤镇练兵造武器”(与前述“千真万确”相矛盾)目前还被人人津津乐道的传播,引以为豪,是文旅可以借力的素材。

讲曹操在淮南的故事,要把这三层分开:史实讲清楚,传说讲明白,文旅讲得休。

实是筋骨,不能戏说;传说是血肉,不妨多讲,但要标明“民间传说”;文旅是延伸,不能着急,先把“曹操来过淮南”这个概念做扎实——来过几次、做了哪些事、留下哪些东西——把故事里的真东西讲完,再谈其他。

寿春城外,淝水东流。隐贤古镇,曹操练兵造器的故事还在巷陌间流传。芍陂岸边,渠水依旧在流。

一个英雄的霸业会结束,但他踏过的土地、留下的渠、打过的仗,会一直替他说下去。



五代后唐官员吕梦奇是山东莱州人,生两子:长子吕龟图后居河南洛阳,生子吕蒙正,是北宋首位状元宰相;次子吕龟祥后居安徽凤台,其孙吕夷简及夷简第三子吕公著担任过北宋宰相,夷简次子吕公弼担任过北宋副宰相。这样就产生了吕氏“一门三相”的不同说法:一种说法是北宋吕氏“一门三相”,即吕蒙正和其堂侄吕夷简及夷简子吕公著;一种说法是寿州吕氏“一门三相”,即吕夷简与吕公弼、吕公著父子三人。本文说的是寿州吕氏“一门三相”。

“忧国忘身”吕夷简

吕夷简祖父吕龟祥籍莱州。公元977年,吕龟祥开始担任北宋寿州知州,因“有惠政及民,民爱留之,不忍舍去”,遂在寿州定居,当时寿州治所设于今凤台县城。后来吕氏成为当地望族,至吕夷简三代相位,成为朝廷宰辅。

吕夷简(978—1044年),字坦夫,少年时代在家乡度过。公元1000年,23岁的吕夷简考中进士,陆续在绛州、通州、濠州、滨州等处为官,后升任提点两浙刑狱。入朝后,因才识卓优、清慎勤政,有“廉能”之誉,成为皇帝身边近臣,宋真宗称赞他“有为国爱民之心”。

公元1022年,宋仁宗继位,因为年幼,由刘太后临朝称制,吕夷简开始以“参知政事”参与执政,虽为相职,但地位比宰相略低。公元1029年,吕夷简升“同平章事”,成为宰相。吕夷简辅佐刘太后,太后“临朝十余年,内外无间,天下晏然,夷简之功为多”。

吕夷简“于天下事屈伸舒卷、动有操术”,具有超强的处理问题技巧。宋仁宗的嫡母是刘太后,生母是李宸妃,宋仁宗出生以后就由刘太后抚养,一直认为刘太后就是自己生母。李宸妃去世,刘太后准备以普通官人安葬。吕夷简据理力争,刘太后指责他想干预官中内事。吕夷简向刘太后反复陈述利害,警告她说:“陛下不以刘氏为念,臣不敢言;尚念刘氏,是丧礼宜从厚。”经他一指点,刘太后恍然

寿州吕氏“一门三相”

周强

大悟,于是按照皇后的规格隆重处理了李宸妃丧事。

果不其然,刘太后去世后,宋仁宗知道相关内幕,只是言辞恳切地下了《罪己诏》,将不知生母的情况归罪于自己不尽孝道,将李宸妃尊为皇太后。同时也感激刘太后的养育之恩,提高了刘太后的治丧规格,刘氏亲族也得到保全,待遇依旧。这段历史在晚清公案小说《三侠五义》中被演绎成“狸猫换太子”的宫廷疑案,虚构了包拯断案,不仅刘太后被污名化,也埋没了吕夷简的斡旋之功。

公元1033年,刘太后去世,宋仁宗亲政,吕夷简短暂免相,不久重又复相。吕夷简向宋仁宗提出正朝纲、塞邪径、禁货贿、辨佞壬、绝女谒、疏近习、罢力役、节元费的8项建议,宋仁宗虚心采纳。公元1037年,吕夷简免相外任,3年后以同平章事第三次入相。又过3年,吕夷简以太尉退休,同年病故,享年66岁,宋仁宗悲泣道:“安得忧国忘身如吕夷简者”。宋仁宗赐其谥号“文靖”;南宋理宗将吕夷简列入“昭勋阁二十四功臣”之中。

“甚似其父”吕公弼

吕夷简生有4子:吕公绶、吕公弼、吕公著、吕公孺。吕公弼、吕公著都曾拜相,吕公绶、吕公孺均为朝廷重臣。

吕公弼(1007—1073年)担任过神宗朝副宰相,年轻时因吕夷简推荐以荫仕为朝廷低级官员。公元1033年,吕公弼26岁,进士落第,赐“进士出身”,虽然享受进士待遇,但规格比进士要低,以后一直在朝廷或地方担任基层官员。吕夷简去世,宋仁宗亲自去府中祭奠,第一次见到吕公弼,觉得“吕公弼甚似其父”,于是“益材其用”,将37岁的吕公弼擢拔为河北转运使,相当于河北路最高行政长官。

河北路与契丹族的辽朝接壤,以

前军队驻扎边境,当地百姓负责供应粮饷,因为当地产粮不足,老百姓的负担很重。吕公弼到任后,疏通一条漕运河道,将江南米粮源源不断地输送边塞,又通过冶铁收益来补充军饷不足。同时吕公弼还将边境富余的军士后移驻后撤,屯垦建镇,老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大量减轻,数百万债务也被免除,这些做法很快就为吕公弼赢得政声。

后来吕公弼又历任开封府和成都府主官。吕公弼治理成都府时,因为人宽厚,为政宽松,有人拿他不过劲。有一名士兵犯法,该施杖刑,他却要赖逃,宁可被杀,也不愿杖责。他以为吕公弼好脾气,不会拿他怎么样。吕公弼对他讲,杖责是按国法,处死是你自愿。于是下令先施杖刑,然后处斩。此后成都官民都知道吕公弼柔中寓刚的威严,敬畏之心油然而生,地方因此大治。

公元1063年,宋英宗即位。次年,吕公弼以枢密副使参与执政,开始进入权力中枢。公元1067年,宋神宗即位,吕公弼进为枢密使,相当于副宰相。王安石变法,得到宋神宗支持,但吕公弼与之政见不同,他数次劝告王安石,“宜务安静”,意思是变法不能操之过急,要顾及老百姓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。

吕公弼的好心却被王安石误解,于是他将全面评论变法之事写成奏疏,准备修改完善后上呈宋神宗,谁知道却被族孙吕嘉问偷取草稿交给王安石,王安石又奏告宋神宗,终于引起宋神宗的不满,于公元1070年引吕公弼罢相,3年后,吕公弼病逝,享年67岁,宋神宗赐谥号为“惠穆”。

“守成良相”吕公著

吕公著(1018—1089年),字晦叔,是吕夷简第三子,历任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4朝,在官场风雨47

八公山上的那盏茶

程晋仑

淮河（淮南）文化漫谈（第七季）征文

一

公元五世纪中叶,一个清秋午后,淮水之畔的八公山,山寺之间,发生了一桩微小却足以留驻茶史的往事。

僧人昙济,设茗待客。来客是两位少年王子——新安王刘子鸾、豫章王刘子尚。茶汤入喉,刘子尚慨然叹道:

“此甘露也,何言茶茗?”

这十二字,载于南朝《宋录》。后世《宋录》全书散佚,幸得陆羽采入《茶经·七之事》,这一声赞叹,方能穿越一千五百余年,流传至今。

短短十二个字,一场山寺茶会,少年一句由衷的咏叹。在浩瀚绵长的中国茶文化长河里,它看似只是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。

但若将历史镜头缓缓拉远,便会察觉这朵浪花分量不凡:彼时禅宗尚未东传建立,达摩犹在域外,可这一杯山茗,已然埋下后世“禅茶一味”精神相契的伏笔。这也是现存文献之中,茶第一次被品饮者冠以“甘露”之名,赋予超越凡俗饮品的灵性赞叹。

这盏淡淡茶汤里,究竟藏着怎样一段山河与人心的往事?

二

先说设茶的主人,昙济。

昙济,河东人氏,十三岁于八公山东寺出家。其师僧导,乃是关中来的一代义学高僧,承鸠摩罗什法脉,精研《成实论》与三论之学。受刘裕之请,僧导于寿春立西昌寺(又称导公寺),开席讲法,门下徒众逾千人。八公山,由此成为南朝江北最重要的佛学重镇。

昙济承统师学,昼夜研读《成实论》《涅槃经》,“以夜继日,未常安寝”。他撰成《六家七宗论》,系统梳理东晋般若学七大流派;本无宗、本无异宗、即色宗、识含宗、幻化宗、心无宗、缘会宗,原著虽亡,吉藏《中观论疏》摘录其文,成为今人研读魏晋般若学空宗不可或缺的核心文献。

大明二年(458),昙济受宋孝武帝征召,渡江赴建康中兴寺开讲,名震京师。一位隐居淮上山谷的义学沙门,能获帝王征请,足见其佛学造诣与声望,冠绝一时。后他驻锡建康庄严寺,与谢灵运相交。谢灵运《山居赋》自注云“昙济道人住孟山,名曰孟埭”,记录的便是昙济晚年游历浙东的行迹。

再看登门造访的二王。

刘子鸾,孝武帝最为钟爱的皇子,生母为宠妃殷淑仪。五岁封襄阳王,后改新安王,八岁加中书令,恩宠冠于朝野。刘子尚为孝武帝第二子,封豫章王,二人是同父异母兄弟。

二王入山拜谒昙济的确切年份,史籍并无明文,依刘子鸾生卒推算,赴山之时,他尚是稚童,少年品茗,脱口称“甘露”,更多是舌尖触到甘润茶味的本心感慨,未必已是深契般若义理的洞见。合理推想,此番入山问道,背后亦有孝武帝对这位名僧的致意与安排。

茶会之后不过两三年,孝武帝崩逝,前废帝刘子业登基。因昔日储位积怨,刘子业对刘子鸾、刘子尚痛下杀手。刘子鸾赐死时年仅十岁,临刑留下“愿身不复生王家”的千古悲叹;刘子尚不久亦遇害。

八公山的这一盏清茶,遂成两位少年王子短暂荣华生命里,一抹清寂、短暂的亮色。

三

茶自何来,是读懂这场茶事的关键。

八公山地处古淮南茶区腹地,峰峦叠翠,泉清土润,天然适宜茶树生长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·肥水》记载,寿春城外肥水沿岸,“有导公寺、山渊寺”,寺院群落依山临水,是江淮一带佛教修行胜地。

唐代刘禹锡任职寿州刺史,写下名句:“桂岭雨余多鹤迹,茗园晴望似龙鳞。”

诗句描摹八公山茶园连绵之景,晴日照耀之下,茶垄层层叠叠,宛若龙鳞。陆羽《茶经·八之出》,将寿州列入淮南茶区,注“寿州下,生盛唐县霍山者,与衡山同”。李肇《国史补》亦载“寿州有霍山黄芽”,霍山彼时属寿州盛唐县,与八公山同属淮南茶区。但唐代的产茶记载,能否直接上溯至刘宋?从五世纪末至九世纪,其间相隔三百年,现存文献并无六朝时期八公山本地产茶的直接记录。昙济待客的茶,或是山中近地所采,或是由外地携来、购置。

《茶经》另引《桐君录》:“西阳、武昌、庐江、晋陵好茗。”古庐江郡与寿春地域毗连。但“好茗”,指一地有饮茶风尚,不等同于本地栽种出产茶叶。寿州窑始烧于南北朝晚期,以黄釉器闻名,陆羽曾评“寿州瓷黄,茶色紫”。窑址出土器物是否专门用于煮茶,仍有待考古进一步佐证。

审慎而论,八公山归属古淮南茶区,六朝江淮之地已有饮茶习俗,昙济所用茶可取自周边;但现有史料,尚不足以证实刘宋时期八公山已有规模化茶园。

四

欲读懂昙济茶事的独特价值,需置于南朝僧人用茶的整体脉络之中。

陆羽《茶经·七之事》记载三位与茶结缘的佛门人物:单道开、释法瑶、僧人。

单道开,东晋十六国敦煌僧人,《晋书·艺术传》载,他于后赵郡城昭德寺坐禅,昼夜不眠、不畏寒暑,修行之余,“时复饮茶苏一二升

而已”。所谓茶苏,一般认为是茶与紫苏调和的饮品。茶于他,是禅修辅具,用来提神破昏,驱散坐禅的倦意。

释法瑶,刘宋高僧,《续名僧传》记其渡江至吴兴武康小山寺,“年垂悬年,饭所饮茶”。饭罢饮茶,茶是日常佐餐之物,融入一日起居。

昙济“设茶茗”待客,则与前二者全然不同。他不是独修自饮,也非饭后随食,而是以茶迎宾,茶成为僧俗之间问道、交谈的媒介。

三条记载,分属不同时代、地域,三位僧人并无师承往来。单道开在北方,法瑶在浙西,昙济则在淮南,互不相识。后世强行将三者串联成一条由“个人修行”到“日常饮食”再到“接引访客”的线性演进链条,属于后世人的建构。更客观的表述是:三条史料各自独立,呈现南朝不同区域僧人用茶的不同面貌;昙济茶事独树一帜,是现存最早记录茶走入僧俗交流场景的文献。

五

核心一问:这场山寺茶会,能否称作禅茶一体思想的源头?

先要厘清史实:刘宋之世,禅宗尚未诞生,达摩尚未渡海来华。昙济修持的是般若学、成实学,与后世南宗之禅,思想脉络并不直接接续。严格来说,昙济的茶事,不能直接命名为“禅茶”,而是般若佛学与茶相遇的早期形态。

更重要的是,“源头”一词暗含线性因果:仿佛后世“禅茶一味”,直接由这次茶会衍生。但现存史料,找不到昙济八公山茶事对唐代禅茶传统产生直接影响的证据。它更像历史长河里一枚孤立的星子,在当时并未掀起持续的思想波澜。

那么这场茶会的意义,究竟何在?纵览佛教茶事演进,大致分为数阶:

初时,僧人独以茶助修行,功用在提神、祛困、疗疾;

继而,茶走入寺院日常,化作待客礼仪;及至唐代,百丈怀海订立《百丈清规》,丛林茶礼制度化、仪轨化;

最后,宋代圆悟克勤拈出“禅茶一味”,茶与禅在思想层面融为一体。

八公山的这场茶会,正落在第二阶段。它是现存最早的茶进入僧俗对谈场景的明确记录。这一判断本身,便自有千钧分量,不必强行串联史料、拔高为完整思想的原点。

八公山的那盏茶,未必是禅茶思想的原点,却是一个标志性的开端时刻。在禅宗尚未降生的年代,一位精研般若的义学僧人,以山中清茶款待两位少年王子。茶汤甘润,被叹为甘露。这声跨越千年的赞叹,是茶与佛学精神相遇最早的文字见证。

六

尚有值得深思的问题:后世谈禅茶,为何几乎不提昙济?

赵州从谏一句“吃茶去”,千百年来反复阐释,成为禅茶的核心公案。而更早的单道开“茶苏”、法瑶“饭所饮茶”、昙济“茶茗”,在禅茶叙事中被边缘化,乃至渐渐遗忘。

这种“选择性遗忘”,本身便是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。

禅茶传统成型之时,需要为自身的文化合法性寻找历史依据。但并非所有早期茶事,都适合纳入这套思想谱系。“吃茶去”简洁空灵,机锋暗藏,承载“平常心是道”的禅旨,天然适合作为公案流传。昙济的山寺茶会,叙事平淡,没有惊心动魄的机锋,难以塑造成一则禅门公案。它被淡忘,恰恰因为它朴素沉静。

这提醒我们:禅茶思想的形成,不只是古人“发现”茶与禅内在关联的过程,更是后世不断筛选、重构、阐释的文化建构。哪些古事被纳入谱系,哪些被舍弃,遵循的不是纯粹的历史时序,而是禅宗自身的思想逻辑与话语策略。

昙济八公山茶事,正是这一建构过程中被遗忘的早期样本。它的价值,不在于蕴藏多少完备的禅茶义理,而在于为我们呈现丛林茶礼制度化之前,僧人与茶如何相处的鲜活样本。

七

八公山上的那盏茶,距今一千五百余年。设茶的僧人早已圆寂,品茶的两位少年王子归于尘土。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,八公山东寺殿宇早已湮灭,片瓦无存。唯有刘子尚那句“此甘露也,何言茶茗”,穿过岁月烟尘,留存于陆羽《茶经》之中。

它不是禅茶思想的完整源头,亦未构建一套宏大的思想体系。它只是一场朴素山寺雅集;僧人置茶待客,少年尝茶而悦。正是这份平淡质朴,让我们看见茶在中国文化最初的精神样貌——茶可以助修行,可以佐日常,亦可承载待客的一份诚心。

当甘润茶汤漫过舌尖,少年脱口赞叹“此甘露也”。彼时他不会知晓,这一句即兴感慨,会成为茶与东方精神交融的不朽见证。

八公山秋风岁岁往还,淝水滔滔东流不息。当年那盏茶汤早已凉透,可山寺之中,僧人、少年、青山、清茶相会的刹那,却以一种安静而坚韧的方式,沉淀在中国茶文化的深处。

附记: 本文核心史料取自陆羽《茶经·七之事》引《宋录》佚文,参校《名僧传钞·昙济传》《高僧传·僧导传》《宋书·孝武十四王传》《水经注·肥水》与刘禹锡《蜀杨八寿州诗》。八公山东寺、西昌寺南朝原建筑已无地面遗存,遗址地望为学界综合方志、山水格局推定,尚无考古实物佐证。